历史研究动态
ISSN: 2959-6718 (print)
雙清學術出版社

Contents lists available at www.qingpress.com
Journal homepage: qingpress.com/zh-cn/journals/139

日本江户后期宽政改革的探究

庞昊龙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日本江户幕府后期，随着封建统治的腐败、商品经济的发展、町人阶层的成长以及外来文化的传播而不断冲击着落后的封建幕藩体制。幕府为了应对严重的统治危机，而相继开展享保、宽政、天保等三次社会改革，企图运用强制的行政与经济手段来挽救没落的封建领主阶级的统治。宽政改革作为第二次社会改革，上承享保改革的“复古主义”理念，下启天保改革的政策内容。改革一方面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幕府内部的社会矛盾，延长了江户幕府的政治寿命，另一方面从长远看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反而激化了封建社会存在的根本矛盾，深刻影响了江户后期封建幕藩体制的内部变革。

关键词：江户幕府，宽政改革，商品经济，朱子学

江户幕府中期(1680−1716)随着战乱的停止，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给予日本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幕府一方面颁布法令，抑制土豪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竭力维护小农经济，并且更新生产技术，改进生产工具，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编纂各类农书，又限制农民的生产活动，禁止种植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交通行业，方便农村与城市往来，并且为满足幕藩领主对商品的需要、鼓励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这样在幕府的大力支持下，日本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急剧飙升，并且初步形成了区域专业化分工，出现了一大批农业特产区。在工商业方面，也兴起了一大批商业化城市，城市经济异常繁荣，町人阶级逐渐兴起，甚至江户城的繁荣程度超过了当时英国的伦敦和法国的巴黎，成为 17 世纪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1]。

然而，日本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只是虚伪的表象，幕藩体制下封建经济的矛盾已经逐渐显露。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村日益被卷入商品化的漩涡，幕府虽多次阻止农村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但商品货币经济已逐渐渗入农村内部，瓦解着农村的自然经济，农业产品商业化的趋势已不可避免，再加上封建领主对小农经济的剥削，致使小农破产者日益增多，严重影响了幕府的财政

2959-6718/© Shuangqing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rticle history: Available online December 20, 2024
To cite this paper: 庞昊龙 (2024). 日本江户后期宽政改革的探究. 历史研究动态, 第 2 卷,第 1 期, 11-18.
Doi: https://doi.org/10.55375/hrt.2024.2.1.12

收入，也引起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幕藩领主与武士阶级的城市生活费用与开销急剧增加，收支失去平衡，致使封建领主愈发陷入贫困的境地，幕府财政也发生破产的危机，而广大商人阶层则渐渐崛起，成长为地方上不可忽视的一股阶级力量[2]。就这样，进入江户幕府后期后，幕府统治的困境非但没有解除，反而还进一步恶化，幕藩领导者为解决危机，迫不得已的效仿“古法”，开展了重在挽救社会危机的宽政改革，试图从封建体制内部解决根本矛盾。

国内学界对江户幕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幕末，多侧重于研究日本如何实现明治维新，走上近代资本主义道路，对于 19 世纪之前江户幕府的历史情况研究较少，少数相关研究多体现在通史性著作或零散的分布于研究幕府前期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新变化等相关论文中。日本学界对江户幕府的研究比较充分与深入，但多停留在单方面论述幕府的政治制度、商品货币经济的活跃等方面，并没有将政治、经济与文化很好的交融全方面的研究分析。

享保改革与宽政改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第一，从背景上看，两次改革都是在江户后期幕藩体制发生严重危机时，幕藩统治者为挽救衰败的封建领主阶级的统治和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而展开的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第二，从内容上看，两次改革都从经济方面展开，企图通过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来阻止商品经济对封建经济的侵蚀，采取各种用剥削广大平民的利益来增加幕府财政收入的政策，没想也根本不会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如享保改革实行“定免法”等新年贡征收方法，让农民负担更沉重的年贡，宽政改革颁布《旧里归农令》强迫流民还乡以及各项稳定农业生产的政策都是为了确保农村的生产环境，增加幕府的年贡收入。享保改革的城市政策推行火灾防策和福利政策，宽政改革的城市政策收容流浪者和继续完善火灾防策与福利政策，两者也是为了稳定城市统治秩序，防止市民起义冲击幕府统治。可见，两次改革在理念上的高度一致。第三，从结果影响上看。两次改革都没有解决商品经济发展与封建经济相冲突这一幕藩体制内部危机的根源，反而都用强制的封建行政手段来推行各种政策，结果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加深了封建体制内部深刻的危机，导致了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宽政改革可以看做是享保改革的继承与延续。

一、 宽政改革的背景

江户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渗入农村，瓦解着农村的自然经济，而享保改革并没有解决幕府的政治困境与财政困难，相反，商品货币经济的持续发展促使农村农民阶级分化加剧，因小农的贫穷而转化来的贫农在日本各地随处可见，再加之由于商业的发展，致使城市的日常开销逐渐增大，导致幕藩领主的逐渐贫困，使得他们将负担转移到农民身上，广大贫民为求生计纷纷涌入城市成为受雇佣的城市下层民，社会底层民众深受农村地主与城市大商人阶级的双重剥削，加深了与封建领主的阶级矛盾，不断动摇着江户后期的幕藩体制[3]。田沼政权改革的失败则加深了幕府的统治危机。

18 世纪后半期，田沼意次成为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的侧用人，不久后就任老中掌握了将军之下幕府的最高权力，开始了延续享保改革的田沼时代。他主张实现幕府政治自由化并积极的应对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制定利用商业资本的经济政策。田沼意次为了重建幕府财政，除了重要的米收入

外还将目光转向其他方面，其于 1772 年积极的公开承认各种行业的问屋商人的同业组织“株仲间”，而以此为基础增大对他们的“运上” (营业税)、“冥加” (上纳金)等各种形式税的征收，经济收入越多的商人承受的税则越多，使对城市商人的管理变得更加合理。随后，田沼于当年发行名为“南镣二朱银”的贷币，以该贷币的重量为基础作为“秤量贷币”，将银币按枚数换铸为“计数货币”，并规定金币与银币的兑换比例，意图通过平稳的货币交换促进经济的活性化。田沼为了避免伴随着生丝输入，金银大量流出的现象，反对采用江户初期消极的贸易政策，而实行积极的贸易政策，其努力的增产铜与俵物(海产品)来从外大量输入金银，将其作为货币材料来增加幕府的利益[4]。并且田沼还极大的扩大新田的开发，他于 1782 年着手开展印旛沼的排沼工作来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年贡收入，而且还将此事项承包给富裕的大商人阶级负责，企图利用商业资本推进政策实施，然而由于利根川的洪水导致失败。最后，田沼还想依靠松前藩与阿伊努族的贸易榷场来开发虾夷地区，派遣最上德内前去调查虾夷地实际情况，然而由于田沼的下台而不了了之。

田沼政权实行合理的经济政策，一度使幕府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开发新田、进行排沼等措施虽然本意是为了更大的剥削农民利益，但毕竟上客观促进了日本落后地区土地资源的开发，增加了耕地面积，一定程度上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粮食供应基础。发行新货币也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当时的货币经济秩序并为之后日本近代货币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经验。实行积极的海外贸易虽主要目的是增加幕府财政收入，但其政策的实施也初步展示了日本身为海洋国家的对外贸易的重要性，这成为日本近代海洋经济战略的先声。但仅仅停留在通过牺牲平民的利益来暂时减缓幕府财政崩溃的过程，而且由于幕府积极的利用商业资本，使得幕府官僚不可避免的与大商人相勾结，贿赂贪污之风横行于世，加剧了幕府政治的腐败，并且由于其是站在维护封建制度的立场上利用并发展商品经济的，则更加深了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而且田沼政权一味的以发展经济为最优先的目标，忽视了百姓的生命安全与诉求，在面对当时因东北冷害而导致的天明大饥荒与浅间山火山爆发而引起的火山灰害时，对于无情的夺去百姓生命的灾害而显得无能为力，农民与町人则深受封建领主与大商人的双重剥削，而逐渐加强了对田沼政权的批判，风起云涌的“百姓一揆”掀起了一次次对田沼政权的反抗，并且还刺杀了田沼意次之子田沼意知，促使田沼政权的衰落，到将军家治逝世后，田沼政权彻底垮台，也标志着幕府陷入面临改革的艰苦困境局面。可以说，田沼政权的政策虽具有适应现实需要，提高幕府财政收入的一面，但其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在封建领主阶级统治上的，田沼意次种种发展经济的措施是勾结和利用大商业资本，从而攫取农民与商人阶层商品经济生产的成果而得以实现的，这使广大商人与农民深受封建领主经济与商业高利贷经济的双重剥削，生活更加凄惨。建立“株仲间”只是壮大了特权商人的势力，而城市一般商人的经营活动则受到特权商人的各种排挤与限制，致使商品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广大农民也受特权商人垄断经济作物，强制用低价购买农民农产品，致使农村生产活动日益萎缩。开发新田、发展海外贸易等政策主要依靠大商人推进，许多大商人开垦新田后转化为在乡地主阶层，拥有城市与农村的双重特权阶级身份，反而扩大了幕府的统治基础，稳定了地方基层的统治秩序。海外贸易的成果也流入大商人与幕府官僚手中，更加剧了两极分化。田沼意次一伙人更搞卖官鬻爵，幕府官僚耽于享乐，大部分政策也流于表面没有实

际实行。因此田沼政权政策的成果只是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掠夺下层平民而暂时缓解幕府财政危机，广大下层平民则境遇愈加困苦，对幕府的不满情绪激增，政策本身并没有推进经济的正常有序发展，反而伴随着农村的凋弊与幕藩体制的动摇，注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反而是激化了幕府的政治与经济危机。

二、 宽政改革的内容

1787 年出身于德川吉宗一族卿三家之一田安家的松平定信继任老中，他辅佐幕府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将享保改革作为理想继续推进复古化的社会改革。

首先，为了防止由冷害而引起的以东北地区为中心的天明大饥荒所带来危害的扩大，解决因为灾害而导致的农民流亡荒废村庄遍地的现象，松平最优先的是推行复兴幕府和诸藩年贡收入的基础来源农村的政策。他于 1789 年实施了“围米制”规定为了预防饥荒，让诸藩大名在平时按米产量储备应急大米，不许平时使用，还在各地兴建社仓与义仓方便储存粮食以备荒年。并且为防止灾民流入城市，保证农村劳动力，其颁布《旧里归农令》奖励那些出身于农村而沦为城市下层民的农民回乡务农，禁止农村农民流入城市[5]。同时，松平还提倡节俭，给予贫困家庭育儿补助金，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并且还鼓励富裕农民向幕府借款开发荒地，以此来稳定小农经济，解决农村凋敝的问题，恢复农业生产。为保证领主贡租收入，还限制农民种植经济作物，除米、油菜籽、棉花之外，一律禁种。

其次，完善江户都市政策。当时的城市因为农村灾民的大量涌入，致使城市下层民的数量急剧增加，城市各町的住宅无法容纳如此大量的人口，使广大无固定居所的城市下层民沦为“浮浪者”，不仅恶化了城市居住环境，而且以浮浪者为代表的贫困阶级还掀起了天明打毁运动，反抗幕府的剥削。于是，松平急需制定城市的治安政策与对贫民的应对政策，其于 1790 年在隅田川的石川岛建立“人足寄场”强制收容浮浪者，安排他们参加职业技术训练，如木工、石匠等。并且除了实行强制的镇压政策外，还实行温和的福利政策。松平于 1791 年制定“七分積金”制度，规定节约城市的管理经费，将省下来的资金的七成用作救济贫民的费用，当发生火灾或饥荒时提供救灾援助[6]。同时，松平还将江户大商人与大地主的私人救济行为制度化，设立江户町会所为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施舍大米，防止他们因走投无路而走上起义斗争的道路，此制度也成为日后日本近代福利院体系的前身。

再次，松平定信改革的重点在于重建幕藩领主封建统治体制。其政策则围绕“秩序恢复政策”、“文教政策”、“风俗统制”三大方面来展开。第一，在秩序恢复政策方面，松平为了恢复担任幕府改革政治与军事的主要依靠旗本与御家人的势力，防止他们因物价上涨经济窘迫而导致破产衰弱的局势，于 1789 年颁布《弃捐令》规定减少甚至免除旗本与御家人向商人的借贷债务，并减少借款的利息，以牺牲商人的部分利益来恢复武家政权的统治秩序[7]。并且为了缓解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引起物价上涨的情况，幕府用强制行政命令手段降低了物价并解散了一批名声不好、扰乱市场物价的“株仲间”，同时，将大商人阶级纳入幕府的统治体制，将其转化为幕府的金融机构并提供资金援助。第二，在文教政策方面，本来儒学在江户幕府时期分为多个流派互相交流辩驳，而为了巩固幕

府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松平于 1790 年颁布“宽政异教之禁”对儒学中朱子学之外的学问(古学、阳明学、拆衷学等)排斥为异学，而将朱子学指定为正学成为幕府的官方思想[8]，同时，以与幕府有着亲密关系的林家的私塾为主，在此设置圣堂学问所主讲朱子学学问，并在全国各地禁止其他儒学流派的讲习与研究，圣堂学问所也成为了之后幕府所经营的昌平坂学问所，奠定了日本近代学校体系的雏形。第三，在风俗统制方面，松平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在于风俗败坏，人们追求奢侈生活，于是其要求净化社会道德，纠正不良风气。不仅取缔当时讽刺时事、扰乱风俗的出版物，如对在当时平民中流行的“洒落本” (以花街柳巷为舞台的短篇小说)的作者山东京传和“黄表纸” (含有讽刺性插画的小说)的作者恋川春町进行处罚，禁止他们再创作此类作品[9]。而且在全社会提倡道德生活，强调男女有别，禁止男女在公共澡堂混浴并查封取缔色情行业，在全社会限制文化自由。

最后，加强对对外危机的防范措施。松平倾力于对对外政策的关注与制定。在当时俄国从千岛群岛南下加紧了在虾夷附近的经济活动，试图利用经济渗透来入侵日本，松平认清并积极地向幕府传递了俄国的侵略野心，并且改变了田沼政权对俄国一味固守的态度和政策，一方面加强防夷思想舆论控制，处罚了因主张强化对外海防，批判幕政的洋学家林子平，但另一方面却运用了其在《海国兵谈》一书中防夷于未然的观点，在 1792 年俄国遣使拉克斯曼来根室要求通商时，以主动的态势出击断然拒绝了俄国的要求，并在之后加强了幕府对虾夷的管理力度并强化了虾夷沿岸的防备，开始认真筹备并贯彻幕府的海防政策[10]。

三、 宽政改革的历史影响

宽政改革是在由天明大饥荒而导致的国内危机和俄国南侵而导致的对外危机双重影响下，幕府内部感到统治的危机感而进行的对危机应对的应急改革，改革的过程中就受到“百姓一揆”等农民起义的不断反抗，在加之幕府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反对派的阻挠，致使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改革虽起到了一定的成果，但改革仍离不开封建主义的范畴，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一方面，改革首先注重复兴农村，为预防荒灾储备粮食，赈济灾民，保持农村人口等措施对医治天明大饥荒对农村造成的创伤，稳定封建小农经济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同时，给予富裕商人贷款，允许他们开垦荒地，使得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转化为地主阶级。这一举措与享保改革中“町人请负新田”的奖励政策如出一辙，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幕府的统治基础，便利了对农村的管理。其次，改革中江户“人足寄场”的设立将大批城市中无家可归的人强制收容，避免了因贫穷人口增多而引发的城市住房与生活环境恶化的问题，有效控制了犯罪率，促使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强迫“浮浪者”学习各种职业技能，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为城市各种行业提供了合格的未来劳动力，带动了城市经济生产的繁荣。并且幕府实施如江户町会所这样的社会福利政策，为城市下层民提供生活保障，有利于安定民心，减少民众的反抗[11]。最后，松平注意到了西方列强特别是俄国对日本的虎视眈眈，不仅以强硬的态度拒绝了俄国对日本的不合理的通商要求，展现了日本民族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而且积极筹备海防，加强对外防卫措施，为幕末攘夷派的海防论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基础，开启了幕未到近代日本国防建设的先声。

另一方面，宽政改革仍是以复古主义为标榜，再不改变幕藩领主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以幕府的

专制权力来强行推行各种政策，必然无法解决封建体制下的根本矛盾。强行实行《弃捐令》以强制手段无条件的废除一切借贷关系，破坏了正常的商品货币关系，而且仅凭一纸法令完全无视现实情况，非但无法解决武士破产问题，而且还引发了商人阶级对幕府的不满情绪。强制收容“浮浪者”安排他们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名义上虽为福利待遇，实际上视其为幕府的公共劳动奴隶，残酷的剥削促使城市下层民也加入“百姓一揆”当中。特别是实施思想统制，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正统思想并在全社会限制文化自由，将田沼时代好不容易推进的社会自由化重新化作乌有，阻碍了社会的思想进步，世人都无不讽道：“当今世道还不如贿赂横行的田沼时代。”可见，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不能靠封建专制权力而强行的压制下去了，幕藩体制本身要利用商品经济。当幕府面临财政危机时，幕府企图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财政危机，但这种背离生产规律的方法只能是以失败告终，使得幕府不得不重视有着巨大利润的商业，并积极地介入到了商品经济中，以其获得的经济利润来保证幕府的正常运转。因此，商品经济既是幕藩体制的支柱，也是幕藩体制的掘墓人，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幕藩体制越发表现出不适应性，要求用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12]，其自然要求冲破幕藩体制的束缚。而改革以行政手段压抑商品经济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加深了封建政治与商品经济的矛盾冲突，引发了幕藩体制的进一步危机。

结语

江户幕府所建立的幕藩体制在德川时代的前一百年间，由于适应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而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到元禄年间(1688−1703)江户幕府的统治达到了极盛时期，社会呈现一片和平繁荣的景象[13]。然而，正是在此繁荣景象下，幕藩体制下潜藏的根本矛盾即封建体制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根本对立冲突及附带的其他矛盾开始逐渐暴露出来，促使江户幕府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宽政改革也基本反映了封建幕藩体制逐渐走向崩溃的历史过程。

宽政改革是在复古主义精神的引导下，企图在封建制度下解决社会危机和根本矛盾，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自然经济，恢复幕府初期武家政治的盛世。但是，改革是在落后的政治国家体制下进行的，改革的推进受到封建幕藩体制的严重束缚，而改革的内容也违背了近世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反而加剧了幕藩体制下深刻的危机，不过改革中一些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取得了成效，从而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宽政改革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其中所蕴含的经验和教训，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上落后的国家实现近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而且也为我们中国如何推进现代化改革提供了不小的历史启示，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参考文献：

[1] (日)沼田次郎(1962). 日本全史.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50.

[2] 郑避楚(2016).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动摇. 日本问题研究, 30(2)，32.

[3] (日)辻達也(2022). 享保改革の研究. 東京：講談社.

[4] (日)倉地克直(2008). 日本の歴史 11−徳川社会のゆらぎ. 東京:小学館.

[5] 王晓燕, 左学德(2006). 日本江户幕府中后期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28.

[6] (日)金子晋右(2014). 寛政改革に学ぶ人道的経済成長戦略. 佐賀大学経済論集, 46(5)，8.

[7] (日)鈴木武雄(1962). 財政史. 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

[8] 倪兆坤(2013). 论德川幕府中期和末期改革的不同点. 青年文学家, (8)，137.

[9] 吴廷璆(1994). 日本史.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91.

[10] (日)信夫清三郎(1980). 日本外交史(上).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44.

[11] 唐利国(2023). 日本通史−近世卷.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2] 张波(2015). 论德川幕府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8(5)，97−98.

[13] 沈从安(1996). 德川时代三大改革的比较研究. 日本学刊, (6):127.

An Exploration on the Kansei Reform in the Late Edo Period of Japan

PANG HaoL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Edo period of Japan, the shogunate system was constantly impacted by the corruption of feudal rule,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odity-based economy, the growth of the townspeople class, and the spread of foreign cultur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serious ruling crisis, the shogunate successively carried out three social reforms, namely, the Kyoho, Kansei, and Tenpo, attempting to use compulsory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means to save the rule of the declining feudal class. As the second social reform, the Kansei Reform inherited the "retro-ism" concept of the Kyoho Reform and initiated the policy content of the Tenpo Reform. On the one hand, the reform eased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shogunat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extended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Edo shogunate.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long run, it violated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ntensified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 in feudal society, which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internal changes of the shogunate system in the late Edo period.

Keywords: Edo Shogunate, The Kansei Reform, Commodity-based Economy, Neo-Confucianism